

“窮人無權成為母親”

——加爾旺《工業園》中的階級、性別與生養問題*

樊 星

[提 要] 帕特里西婭·加爾旺 1933 年出版的小說《工業園》以聖保羅紡織女工生活為中心,開創了巴西都市無產階級小說的先河,也是一部有著鮮明女性主義色彩的作品。階級與性別視角的結合使加爾旺將目光聚焦於巴西底層女性,突出她們渴望生養子女而不得的困境,而這正是底層男性與資產階級女性都不曾面對的狀況。與同時期盛行的精英女性主義觀點不同,在《工業園》中,履行母職並非女性自由的障礙,而是革命的最終訴求,象徵著性別與階級的雙重解放。

[關鍵詞] 巴西文學 左翼文學 女性 生養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2 - 0163 - 09

帕特里西婭·加爾旺(Patrícia Galvão)是巴西文學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作為巴西現代主義運動中公認的繆斯女神,加爾旺年少時便深受知識分子追捧,其筆名“帕古”(Pagu)便來自於著名詩人勞爾·波普(Raul Bopp)的獻詩,之後更因介入巴西現代主義運動推手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與畫家塔爾西拉·杜·阿馬拉爾(Tarsila do Amaral)的婚姻而名聲大噪。在先鋒女性的形象之外,加爾旺的另一重身份是左翼鬥士。她 21 歲時加入巴西共產黨,甘冒風險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不久便遭到逮捕,成為巴西歷史上第一個女政治犯,出獄後又克服重重困難,獨自前往蘇聯“朝聖”。然而,在加爾旺回憶上述傳奇經歷時,卻並未表現出絲毫的自得欣喜。她坦言自己之所以接受現代主義者的邀約,是為了反抗社會傳統價值,但最終卻發現那些男性知識分子的讚美與幫助,也附帶著覬覦與利用。與此同時,受限於其女性身份,政治活動也要求她做出更多的犧牲。為了完成上級安排的工作,她不僅被迫拋下年幼的孩子,獨自在外生活;有時甚至需要利用女性魅力,以自尊為代價換取情報。^①

這種身為女性的覺醒與無奈,在加爾旺處女作《工業園》(*Parque Industrial*, 1933)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儘管這部小說以聖保羅女工生活為核心,開啟了巴西無產階級文學的先河,但卻並非在巴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巴西‘30 一代’左翼作家研究”(項目號:19CWW018)的階段性成果。

西共產黨授意下的宣傳之作。恰恰相反,由於黨內政策的嚴令禁止,加爾旺無法使用本名或已為人熟知的筆名出版,而只能化名“馬拉·洛博(Mara Lobo)”。《工業園》中某些不雅用詞與性描寫也超出了當時一般讀者的接受程度,甚至連其政治盟友也認為這本書“不適用於女子與少年閱讀”。^②針對加爾旺性別意識的超前性,一些女性主義批評者已經做出了較為詳盡的研究,如蘇珊·貝斯(Susan Besse)就曾經直言不諱地指出,《工業園》在挑釁資產階級社會的同時,其“露骨的性描寫與激進的女性主義視角”也會引起黨內同僚的不滿。^③而希拉里·歐文(Hilary Owen)則表示,加爾旺的作品之所以未能受到巴西左翼作家群體的歡迎,是因為她對女性性別的關注超越了單純的階級分野。^④

然而,如果說加爾旺的性別意識對當時主流的階級理論形成了衝擊,其階級理念也同樣打破了當時流行的性別話語,但這一點卻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事實上,在這部小說中,不僅存在著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也存在著女性對男性甚至同性別之間的暴力。而只有談及生育及撫養問題時,性別差異才直觀地顯現出來,因為出於生理與社會方面的原因,女性需要為繁育後代付出更高的代價,底層婦女更常常被剝奪親自教育子女的權利。但在20世紀上半葉,這種無產階級婦女的生養困境卻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那時巴西關於女性生育的討論主要有兩類:一類以優生學理念為基礎,將女性生育與國家未來相聯繫,認為白人女性應當盡可能多生育,保證子女健康強壯,以便將良好的種族基因延續下去;^⑤另一類則採用激進的女性主義視角,以抨擊男權社會結構為目標,主張自由戀愛、享受性愉悅、擁有離婚權與墮胎權、保證生育自願與生育自覺。^⑥這兩類觀點都將母職視為無需爭取的權利甚至是無法拒絕的義務,卻未曾想過此時的底層女性往往難以順利生產,更無力將孩子撫養成人。

《工業園》的開創性正體現在它這一問題的關注上。一方面,巴西彼時關於性別問題的討論均聚焦於精英女性身上,對無產階級女性並不關心。另一方面,以社會控訴與階級平權為目標的作品即使注意到窮人的生養困難,也難以闡明女性面對這一問題的真實感受。加爾旺的優勢正在於她在女性覺醒與革命鬥爭中的可貴經歷,這使她能夠意識到生養這一問題的性別與階級特徵。通過聚焦無產階級女性生育及撫養方面的困境,加爾旺指出由於生活資料缺乏與男權社會偏見的共同影響,底層婦女往往歷經妊娠之苦,卻難以將自己的子女養大成人,而這是底層男性與資產階級女性都不曾面對的問題。如此一來,底層婦女的母職困境便反映出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壓迫,解決這一問題也就意味著更加徹底全面的變革。

一、無關性別的剝削

儘管《工業園》體現出強烈的女性意識,但正如其封面所標識的那樣,它首先是一部“無產階級小說”。事實上,在涉及生育問題之前,《工業園》出現的所有壓迫都不分性別,因為對於社會底層群眾而言,無論男女都可能受到經濟剝削乃至性剝削。這解釋了為何小說雖聚焦於城市女工的生活,其中卻不乏男性工人的身影,他們從事著與女工相似的工作,也同樣承受著資方的壓迫。小說第一章中,女工布魯娜因為上班時犯困,頭髮差點被機器纏住,得到一位男性工友的善意提醒。這番談話被車間領導發現,兩人均遭到了辱罵和訓斥。面對這種情況,男工也只能低下頭去,不發一言,因為這是“每一年、每一個星期、每一天、在每個部門都會上演的事情”。^⑦

相較於經濟上的壓迫與剝削,《工業園》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性壓迫和性剝削,女性不僅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甚至還可能成為施害者。全書第一次明確出現性交易關係時便指明了這一點:“貴

婦與她包養的小白臉一起走下汽車”。^⑧儘管只是一帶而過，但卻傳遞出一個訊號，說明比起男女關係中的不平等，加爾旺更為關注富人對於窮人的全面操控。除上層女性對底層男性的包養之外，後續情節中還出現了上層女性對底層女性的騷擾，如埃萊奧諾拉在借婚姻步入上層社會之後，卻轉而對閨蜜瑪蒂爾德提出性要求；也有上層男性對底層男性的侵犯，如男收銀員佩佩在醉酒狀態下，被一群富家少爺強姦；自然也不乏富人男子誘惑未婚少女，又或是對家中女僕進行性壓榨的情況。針對這一點，坎諾斯特(Laura M. Kanost)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在《工業園》中，性是作為經濟剝削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加以展示的；除去一個可能的例外，小說中的性遭遇都被小心地設定在工人階級生產者與上層消費者之間。”^⑨

憑借上述內容，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出，性剝削的階級因素大於性別因素，但加爾旺卻仍更進一步，通過對同一階層男女關係的描寫，打破了男性具有的絕對霸權，展示出男女關係中容易被忽視的側面。以埃萊奧諾拉與阿爾弗雷多夫婦為例，儘管埃萊奧諾拉依靠婚姻才得以實現階級躍升，但在成婚之後，她卻能夠脫離丈夫的管束，甚至明目張膽地將丈夫支開，以便在家中與女友偷情。她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部分是因為正式的婚姻能夠保障她不至跌落到窮困之中，這與巴西1977年才允許離婚有著莫大的關係。另一方面，儘管直到1940年的巴西刑法中，通姦依然被視為犯罪，女性通姦尤甚，^⑩巴西資產階級男性卻常為虛榮懦弱所困，傾向於無視妻子可能的背叛行為。某種意義上，埃萊奧諾拉的行為可以說是承襲了巴西經典都市小說中的叛逆女性，她們都在自願邁入婚姻之後，又通過(疑似)出軌，實現了對男權秩序的僭越與顛覆。^⑪

然而，這種女性對男性的僭越通常只在女性比男性富有，或者二者處於同一階級時才可能實現。因此，在得知妻子的風流韻事之後，阿爾弗雷多只能將興趣更多地轉移到無產階級(女性)身上。在《工業園》中，敘事者將這一轉變更多地歸結於他對馬克思主義原有的興趣，以及他對資產階級女性道德的失望，但阿爾弗雷多本人在面對同階級女性時的弱勢，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原因。如果說，在上層社會中，女性可以通過出軌實現自身的“解放”與性別權力的逆轉，那麼在底層敘事中，性本身則被描寫成一種特殊的資源，正如下文所述：

白十字街繼續發洩著布拉斯街區的精力。

——工人連性生活也不能有！

一名手淫的失業者在街角搖晃著。一個混血姑娘吃著薄荷糖。她發現那個小夥子在牆上蹭著。她大笑著將手放在兩腿之間，面對其他姑娘，興奮地模仿著旁人那可悲的動作。

——如果我能脫離這種生活！

——傻子！富婆比我們還不如！我們不藏著掖著。而且是生活所迫。^⑫

白十字街是下等妓院所在的街道，而失業者卻比底層妓女更為不如，只能靠手淫解決生理需求，並因此遭到後者的嘲笑。在這段描寫中，加爾旺沒有對底層人採取任何美化，而是直白地展現了他們的粗野與殘酷，這當然也符合馬克思對於流氓無產階級的描述。而妓女對手淫者與富婆的雙重嘲弄卻包含著更為複雜的意味。前者體現出她們將性作為交易手段的自然與自得，尤其當她們發現自己具有手淫者所欠缺的性資本時；而後者則在強調富人性生活開放的同時，又因她們並非“生活所迫”，而將這種自發的性需求當作值得鄙夷的行為。

如果考慮到“工人連性生活也不能有”是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嚴厲控訴，那麼加爾旺對於性本身的態度就更加值得玩味，這也與其自身的經歷密切相關。作為生於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先鋒女性，加

爾旺幼時便將性作為打破既定秩序的叛逆行為。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時，她還不滿十二周歲，對這件事本身極為懵懂、毫無準備，只是將其視為“反對一切原則，反抗一切道德”^⑬的重要事件。在其自述中，加爾旺強調她那時在身體與思想上都尚未成熟，促使她行動的不過是一時衝動，而之後才萌生出愛意。即便如此，在她與對方在一起的兩年裡，一直對性行為本身感到抗拒和厭煩。14歲那年，她第一次懷孕，但尚未來得及將這個消息告訴孩子的父親，對方便以出國為由提出分手。失去第一個孩子對她造成了劇烈打擊，令她臥床休息了整整一年。

缺少快感的性經歷加上痛苦艱辛的流產與保胎，這些因素使加爾旺對資產階級女性宣揚的性解放有了更多警惕，同時也對期待生育而不得的無產階級女性有了更多同情，因為加爾旺雖然出身於小資家庭，卻生長於一個無產階級街區。在加入巴西共產黨之後，為了遵從融入群眾的要求，這位現代主義“繆斯”有段時期更是拋下一切，真正做起工人，以體力勞動賺錢，對底層女性的悲苦也有了更多了解。憑借親身經歷與親眼見證，加爾旺深刻意識到精英女性與底層女工乃至妓女之間的巨大差異，尤其是其在生產與育兒問題上的表現。

二、有關階級的生育

在出版《工業園》之前，加爾旺曾為報紙《人民的人》（*O Homem do Povo*）撰寫專欄《人民的女人》（*A Mulher do Povo*），^⑭在其中表達了她對階級與性別的態度。在1931年3月27日的創刊號上，加爾旺發表了《馬爾薩斯之外》（“*Maltus Alem*”），從提出人口論的馬爾薩斯入手，對精英女性與底層女性的境況做了尖刻的描述。她認為，除去大多數的傳統資產階級女性之外：

還有一小波來自若昂佩索阿的精英女性，她們在女性主義及先鋒派的名義下擾亂巴西的革命運動，叫囂著性解放、生育自主、“知識女性”的投票權，認為老馬爾薩斯的指導能夠解決世界上的一切問題。

（……）然而，她們卻忘記了，在最窮困的階層中，生育限制幾乎已經存在，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尚待解決。^⑮

精英女性追求的“自主生育”（*maternidade consciente*）主要意味著“節育”，因為傳統道德中對女人的期待便是結婚生子。即使在20世紀初，聖保羅的中產女性有機會走上工作崗位，但她們中的大多數依然會在結婚後回歸家庭。與此同時，社會對女性的優待也建立在將她們視為“潛在母親”的基礎上，對她們的保護也即著眼於對下一代的保障。^⑯因此，在女性層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精英訴求與底層現實之間的矛盾：當中產女性要求性解放時，底層女性很可能一早便失去了童貞；當中產女性要求生育自主時，底層女性常常無力生下或撫養自己的孩子；當中產女性倡導投票權等政治權利時，底層女性連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加爾旺將自己與同時代的許多女權主義者區別開來。比起性解放與節制生育，她更關心底層女工如何能夠拒絕非自願性行為，如何能夠有條件獨自生養孩子，實現做母親的願望。尤其是在生養後代的問題上，貧困階層有著精英女性未能理解的需求與困難。

《工業園》一開篇，加爾旺便將這一問題直觀地擺在讀者面前：“在布拉斯區的上百條路上，社會中的私生子排起長隊。私生子與其他人的區別在於，他們沒有舒適的生活與富庶的遺產。資產階級總是有合法的孩子。即使那些高尚的妻子是公共情婦”。^⑰在葡萄牙語中，“合法”與“婚生”是同一個詞 *legítimo*，相應的，“非婚生子”即為“非法的孩子”。在這裡，加爾旺以反諷的語氣指出，孩子在社會地位上的合法性與他是否婚生並沒有絕對關係，對於上流社會的貴婦來說，即使通奸所生

的孩子，依然能夠得到婚生子的待遇。

窮人的後代則面臨著另一種境況。他們無法得到適當的照料，無法擁有正常的親子關係，也難以獲得足夠的食物。在小說中，甚至有一位貴婦僅僅因為窮人家的小孩可愛，就擅自帶走了他。而當家人因此報警時，警察卻說孩子在富人家裡會過得更好。可見對於底層女性、尤其是單身媽媽來說，將孩子生下來撫養長大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因此，書中多次出現“窮人就不應該有孩子”、“窮人無權成為母親”¹⁸等簡單直白的表述。

而支撐這些表述的，是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事實，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科琳娜的故事。科琳娜原本在一家裁縫店工作，後來受到富人阿納爾多的誘惑，懷上了他的孩子。可以說，與失貞相比，受孕才是科琳娜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在確認懷孕之前，科琳娜儘管承受著性剝削，卻並未完全喪失選擇的自由，甚至她本人還樂在其中。在這一點上，她與《工業園》中的許多人物有著相同的命運。然而，在懷孕之後，她的生活便不復從前，一切都超出了她的控制。

作為全書的兩個核心¹⁹人物之一，科琳娜一直是評論界解讀《工業園》的關鍵。然而，這種解讀往往僅從種族問題與身體政治入手，卻忽略了其對於生養問題的意義。事實上，在科琳娜失貞的鋪墊之後，書中第一次出現旁人對科琳娜命運的討論，便與懷孕的預兆息息相關：“等著瞧吧，她就是用來上床的。上帝原諒我說別人的壞話！但你們不覺得她開始發福了嗎？”²⁰這一猜測很快便得到證實，科琳娜對此感到既害怕又興奮。她擔心孩子繼承自己較深的膚色，擔心母親的男友發現她未婚先孕，但又迫不及待地猜測孩子的樣貌，感到期待與欣喜。

之後，懷孕的消息流出，一切急轉直下。她先是被母親的男友趕出家門，無家可歸。接著，因為拒絕墮胎，她被裁縫店解雇。稍晚一些，她終於見到胎兒的父親，對方卻丟下一張鈔票揚長而去。接連受到打擊之後，科琳娜流落至一家妓院，開始了妓女生涯。但是，她並未放棄希望。甚至當她滿身疲憊地接客之後，想的還是“再來一個，就有錢給兒子買搖籃了”。²¹

因此，上述遭遇儘管悲慘，卻並未造成致命性打擊。而悲劇的高潮在於，科琳娜在諸多犧牲之後，仍然未能保住她的孩子，更確切地說，是由於孩子天生缺陷，促使科琳娜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子。這段描寫驚悚殘酷，充滿隱喻：

在那兩腿深處，一個巨型洞穴異乎尋常地增大。漆黑的洞穴，撕裂。擴張。像個咽喉。為了突然嘔吐出一個紅色的活物。

護士向後退去。助產師向後退去。醫生留在原地。抬起的眉毛宣告出驚訝。他檢查著那鮮血淋漓的肉團，它叫喊著，弄髒了床單。兩只纖細的胳膊要著孩子。

“別讓她看到！”

“是個怪物。沒有皮。是活的！”

“這個女人腐爛了……”

科琳娜不停地要著孩子。她的眼睛被蒙上了。怪物在她身邊哭泣。²²

對於 1930 年代初期的巴西讀者來說，上述對於怪物的描寫無疑會讓人聯想到弗蘭肯斯坦，尤其是那聲“它活著！”的驚歎，更與 1931 年詹姆斯·惠爾 (James Whale) 執導的電影情節完全一致。²³考慮到加爾旺與瑪麗·雪萊在生平經歷上的相似性，《工業園》與《弗蘭肯斯坦》在怪物誕生方面的聯繫或許並非偶然。艾倫·莫爾斯 (Ellen Moers) 曾將《弗蘭肯斯坦》視為一則生育神話，並指出瑪麗·雪萊早年混亂的生育體驗是促成其這一創作的重要原因：“她十六歲懷孕，在接下來的五年中也幾乎一直在懷孕；但她並非一個可靠的母親，因為她的大多數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她

也並非一個合法的母親，因為她並未結婚——至少在十八歲的瑪麗·戈德溫開始撰寫《弗蘭肯斯坦》時並未結婚。怪物便是如此誕生的。”²¹加爾旺的經歷與之如出一轍，第一個孩子的流產與第二個孩子的虛弱讓她理解生養子女的艱難，也促使她將這一問題作為核心來進行《工業園》的創作。

無論瑪麗·雪萊還是加爾旺，都一面承受著缺乏照料的生育之苦，一面由因子女的疾病死亡而感到愧疚，因此她們筆下所誕生的怪物也都可怖而又可憐。正如在《弗蘭肯斯坦》結尾那個怪物的自白一樣，科琳娜誕下的也是一個“不幸的棄兒”與令人厭惡的“怪胎”。²²然而，《工業園》畢竟是一部現實小說，孩子也只能是男女結合之後的造物。很明顯，此處逃避照護義務的主要是胎兒的生父，而科琳娜即使面對的是一個“鮮血淋漓的肉團”，也仍將其視為是自己的孩子。身為母親，她並未遺棄自己的骨肉，而是選擇將其殺死，並承擔接下來的後果：“沉重的鐵門打開，關上。科琳娜被捕了。——你犯了什麼事？（……）——我殺了我的兒子……”²³

在這裡，科琳娜並沒有用怪物等措辭為自己開脫，而是直接承認了弑子行為。然而，她所經歷的一切痛苦，卻是其他的女性所不能也不願理解的。上層女性斷定，窮人殺死孩子只是為了逃避養育的責任。甚至連死去的孩子也無法引起她們的同情，因為她們只關心自己的孩子——他們漂亮、圓潤而又健康，而對醜陋早夭的怪物毫無興趣。加爾旺也並未描寫科琳娜弑子的內心動機，仿佛這並非個人意志的選擇，而是無法逃離的宿命。正因為如此，當一個女囚說“我們所有人進來都是因為錢，只有這個賤人殺了自己的兒子”時，敘事者不禁反駁道：“沒人知道她也是因為錢。”²⁴

在現實意義上，如果科琳娜妊娠期間受到良好照料，可能就不會生出有缺陷的孩子，如果孩子出生後有錢治療，也就無需將他殺死。而在隱喻層面，科琳娜直到臨產前仍對阿納爾多念念不忘，甚至準備給孩子取同樣的名字，孩子便是她與上流階層最後的聯繫。正像福柯曾經指出的那樣：“所謂怪物，便是在一個生物體上能夠看到兩個類別的結合”，²⁵這種跨越階層的結合決定了他的孩子必然是一個怪物。而科琳娜之所以選擇弑子，一方面是為了解除孩子的痛苦，另一方面則說明她的確缺少鬥爭意識，因為怪物在被社會排斥的同時，也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挑戰，它以血肉為媒介融合兩個階級，也即打破了兩者之間決然的區隔。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叫喊便意味著反抗，弄髒醫院的床單也即敗壞了資產階級道德對純潔的要求。科琳娜殺死孩子，確實是親手扼殺了這種反抗的可能，同時也說明憑借她個人的力量，無法顛覆當時的社會結構。

三、階級解放與性別解放

在 20 世紀初期的巴西城市，貧民階層的女性幾乎不可能獨自撫育幼子成人。她們首先依賴的自然是孩子的生父，但當生父缺席，或因失業、疾病等原因無力養家時，孩子大多交予近親撫養，或者送養在無血緣關係的第三方。這是因為彼時社會機構能夠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而女性的工作收入也十分微薄，更不可能分出精力來照顧孩子。即使在改嫁之後，貧民女子也很難將孩子帶入新家庭，而更可能將他留在自己或前夫的某一位親人身邊。除了經濟上的匱乏之外，女性還需要面對更為嚴苛的道德審視，以證明自己適於教養下一代。

可以說，在巴西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如科琳娜一樣貧窮的獨身女性很難履行母職，即使成為母親是她最大的願望。而科琳娜不僅缺少孩子父親的認可與親眷的支持，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更因妓女的身份而備受歧視，進一步喪失了撫育後代的資格。因此，即使她勉強將孩子生下來，也不可能將其撫養長大。

關於女性育兒的種種限制，巴西諸多社會學著作中都有所展示。在分析巴西父權社會中女性

身份時,艾蕾耶特·薩菲奧特(Heleieth Saffioti)延續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等左翼批評者的觀點,指出女性扮演的四種基本角色:勞動者、性對象、生育者以及教育者(負責兒童的社會化),並強調除“勞動者”之外,女性的其餘三重身份與家庭相關,且這些家庭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作為勞動者參與到生產活動中。²⁹也就是說,成為母親往往意味著勞動者身份的喪失,除非有家庭(男性)的支持,將缺乏育兒的基本經濟條件。

而從社會習俗的角度出發,羅伯托·達馬塔(Roberto DaMatta)更進一步將女性角色中的“性對象”與“生育者/教育者”區分開來,指出在巴西社會中,女性被割裂為“母親—貞女”與“妓女”兩個形象:前者的地位來自於美德,卻必須放棄自身性別的慾望;後者在獲許性慾的同時,則被剝奪了繁育權,因為“母親—妓女”的結合“不僅是一種冒犯,更是自相矛盾”。³⁰這一結論建立在巴西父權制的歷史基礎之上,既說明了女性整體上的從屬地位,也證實了女性內部難以彌合的階層分化。這種分化將不同身份的女性——如奴隸制時期莊園主的夫人與供其享樂的女奴,資產階級的太太與一無所有的娼妓——置於彼此的對立面,因為對方享有的恰是自己被剝奪的權利。

在《工業園》中,未婚先孕的科琳娜就面臨著這種情況,不僅男友和家庭拋棄了她,就連她之前的女伴也都對她避之不及。但是,在科琳娜的悲劇徹底呈現之前,加爾旺卻曾指出一條可能的出路,那便是依靠無產階級女性之間的團結互助,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加爾旺將這種社會理想寄託在女主人公奧塔維婭身上,她不僅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是唯一想要幫助科琳娜的人。即使此前並不熟識,奧塔維婭依然主動提出要收留無家可歸的科琳娜,直到她生下孩子或是重新找到工作。不過,這種幫助卻有一個未曾言明的前提,就是科琳娜需要接受奧塔維婭的觀點,認清資產階級男友的欺瞞與虛偽,並努力將後代培養成為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正如奧塔維婭在勸說科琳娜吃東西時所表達的那樣:“吃吧!你必須支撐你的孩子。他也將成為一個勞動者,你需要保證他強壯。”³¹而科琳娜作為一個尚未覺醒的普通女工,並沒有勇氣參與建造一個新世界,也無法認識到在舊有的社會結構下,個人根本無力改變早已注定的悲劇。

由此可見,加爾旺確實是將階級解放作為女性解放的基礎來加以討論的。正如薩菲奧特論證的那樣,資產階級女性運動無力實現女性的真正解放,因為它們要麼是純烏托邦式的,幻想能夠在不觸及社會根基的情況下改變女性的社會境遇;要麼就是在有意識地同現有社會規範合作,滿足於表面且片面的權利平等。³²

然而,在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出發反思女性問題時,加爾旺關注的絕不僅僅是女性的經濟與政治地位,還有她們獨特的身份與情感需求,因為至少在生養子女相關的問題上,女性擁有與男性全然不同的生命體驗,階級差異的消失並不代表性別問題的解決。事實上,在經歷過孕期及分娩之後,女性與孩子的情感關聯更為強烈,在育兒過程中也承擔更多的責任,但她們卻無力決定子女的教養方式,也更難受到孩子真心的尊敬與認同。在一個家庭中,行使教育權的往往是父親;而單身母親受制於經濟條件,也只能將孩子交給他人撫養,或者放任他們在糟糕的環境中長大。在這個意義上,保障女性擁有履行母職的權利,使其能夠親身參與對下一代的教育與塑造,也是提高底層女性地位、改變既有社會權力結構的有效方式。

四、結語

在《帕古:生命—作品、生命之作、生命》中,安東尼奧·里塞里奧(Antonio Risério)提出,加爾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她“情感與理念”結合的生命歷程以及在“政治、詩性與存在”意義上的傳奇

色彩。^③這與其說是將作者的生平經歷凌駕於其作品之上，倒不如說是解釋了其作品價值的由來。加爾旺從來不是一個照本宣科的理論家，而是執著於親身體驗的實踐者。她的性別意識並非移接自歐美的女性主義風潮，而是萌生於年少時的叛逆、失戀、流產與兩度結婚生子的經歷。這讓她能夠輕易地看出彼時資產階級女性運動的局限性，轉而宣揚一種更為徹底的性別解放。她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也並非來自書本，而是直接參與黨內工作並遵照要求融入無產階級，親身體會女工的困苦生活。這使她可以無障礙地跳出階級鬥爭的局限，意識到階級內部的性別區隔，將目光聚焦於底層女性身上。

作為階級與性別壓迫的雙重體現，底層婦女的生子與育兒困境便成為《工業園》探討的核心問題。在經濟層面上，貧窮不僅構成撫育子女的現實障礙，甚至能夠直接威脅到生育行為的合法性，正如書中提到的“窮人就不應該有孩子”。^④在性別層面上，未婚生育的後果基本完全由女性承擔，而單身母親又非常容易陷入赤貧，形成一種惡性循環。^⑤與此同時，對未婚生子的污名化也會使她們面臨更多困難。倘若以當時的道德標準來看，她們根本不具備成為母親的資格，也無法養育出符合社會期望的後代。

因此，在加爾旺筆下，保障底層女性生育與教育權利便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意味著階級與性別意義上的雙重解放，讓女性可以不受經濟條件與婚姻狀況的限制，既有節育的自由，更有生養的保障，而無論對於當時還是現在的社會現實而言，後者都比前者更加難以實現。《工業園》選擇直面這種困難，將底層女性的覺醒與團結作為最佳的解決方案，並通過階級話語與性別話語的結合，提出更為全面徹底的變革訴求。

①⑬ Patrícia Galvão, *Paixão Pagu: uma autobiografia precoce de Patrícia Galvão*, Rio de Janeiro: Agir, 2005, pp. 130-133; p. 53.

② Augusto de Campos ed., *Pagu: vida e obra*, São Paulo: Brasiliense, 1987, p. 102.

③ Susan K Besse, “Pagu: Patrícia Galvão – Rebel”, in William H. Beezley and Judith Ewell, eds., *The Humam Tradition in Latin America*,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p. 111.

④ Hilary Owen, “Discardable Discourses in Patrícia Galvão’s Parque Industrial”, in Solange Ribeiro de Oliveira and Judith Still, eds., *Brazilian Feminisms*,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1999, pp. 70-71.

⑤ De Matos, Maria Izilda Santos, “Em nome do engrandecimento da nação: representações de gênero no discurso médico-São Paulo 1890-1930”, in *Diálogos*, v. 4, n. 1, 2000, p. 88.

⑥ Rago, Margareth, “Entre o anarquismo e o feminismo: Maria Lacerda de Moura e Luce Fabbri”, in *Verve*, n. 21,

2012, p. 70.

⑧⑦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Patrícia Galvão, *Parque industrial*, Porto Alegre; São Paulo: Mercado Aberto; EDUFSCar, 1994, p. 19; p. 23; pp.54-55; p. 17; pp.71-72p. 42; p. 54; p. 57-58; p. 59; p. 59; p. 47; p. 71.

⑨ Lausa M. Kanost, “Body Politics in Patrícia Galvão’s Parque Industrial”, in *Luso-Brazilian Review*, v. 43, n. 2, 2006, p.92.

⑩ Margarita Danielle Ramos, “Reflexões sobre o processo histórico-discursivo do uso da legítima defesa da honra no Brasil e a construção das mulheres”, in *Estudos Feministas*, v. 20, n. 1, 2012, P.67.

⑪ 許多巴西文學作品都對此有所展現，最經典的當屬馬查多·德·阿西斯的《沉默先生》與《布拉斯·庫巴斯死後回憶錄》。前一個故事中，男主人公對於妻子的懷疑由始至終，卻一直未能鼓起勇氣求證；後一個故事的女主人公則在婚後背叛了丈夫，與男主人公私通。這一主題也同樣出現在盧西奧·門東薩的《通奸者的丈夫》（*O Marido da Adultera*, 1888）、阿

盧伊奇奧·阿澤維多的《棚戶房》(*O Cortiço* , 1890) 等作品中。

⑭《人民的人》是加爾旺與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婚後合辦的報紙,旨在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進行批判,以喚醒巴西精英的革命意識。其中專欄《人民的女人》由加爾旺執筆,重點關注巴西女性問題,尤其是精英女性對底層女性生活的無知與忽視。由於遭到警察查封,《人民的人》僅在1931年3月至4月出版了8期便宣告停刊。

⑮Pagu, “Maltus Alem”, in *O Homem do Povo* , 1931-03-27, p. 2.

⑯Lena Oak Suk, “ ‘ Only the Fragile Sex Admitted ’ : The Women’s Restaurant in 1920s São Paulo, Brazil”,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 Vol. 51, N. 3, Spring 2018, p. 593.

⑰另一個核心人物為女革命者奧塔維婭,關於她的分析在後文中會出現。

⑱這部電影在專業電影雜誌1932年,這部電影在里約熱內盧、聖保羅、弗洛里亞諾波利斯等地相繼上映,取得巨大反響。巴西各大主流報紙都曾多次提及這部電影,《電影藝術》(*Cinearte*)、《無聲的場景》(*A Cena Muda*)等專業電影刊物也對它進行過長篇報道。

⑳Ellen Moers, *Literary Women* , New York: Oxford U-

niversity Press, 1976, p. 92.

㉕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梁永剛譯,廣西桂林:漓江出版社,2021年,第285頁。

㉘Michel Foucault, *Abnormal: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3, p.64.

㉙㉚Heleieth Iara Bongiovani Saffioti, *A mulher na sociedade de classe: Mito e Realidade* , Petrópolis: Vozes, 1976, p.53; p.279.

㉛Roberto DaMatta, *Carnavais, Malandros e Heróis: Para uma sociologia do dilema brasileiro* , Rio de Janeiro: Rocco, 1997, p. 141.

㉜Antonio Risério, “Pagu: Vida-Obra, Obravida, Vida”, in Augusto de Campos, ed., *Pagu: vida e obra* , p. 29.

㉝在科琳娜生產時,助產士就注意到幾乎所有貧困的產婦都沒有姓氏,既說明這些貧窮的姑娘大都沒有父親,也暗示父親的缺席加劇了貧窮。See Patrícia Galvão, *Parque industrial* , Porto Alegre; São Paulo: Mercado Aberto; EDUFSCar, 1994, p. 57.

作者簡介:樊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博士。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桑海]